

而当时欧美、日本制作明信片、图册，也多刊印此类照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人施塔福（Francis Stafford），他1909年起便受聘于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摄影技师。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时，施塔福去武汉拍摄新闻照片。因享有外国人特权，施塔福得以进入清军、民军双方营地，实拍了许多历史场面。因此，诸如湖北军政府成立、阳夏战争等场景，皆在其镜头之中。

另一位值得注意的摄影者是英国人埃德温·丁格尔（Edwin J. Dingle）。丁格尔是英国的传教士，他于1884年来到中国，并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丁乐梅。他长期在中国传教，熟悉中国社会，写了不少文章，将中国国内情况介绍给西方世界。

辛亥革命期间，丁格尔作为上海《大陆报》的记者住在汉口，目睹了革命发生初期的种种情况。他利用特殊的身份，奔赴汉口、上海和南京等地，周旋于各派政治力量之间，探寻幕后消息，与起义军最高领导人及清廷官员都有过密切接触。他是最早访问武昌起义都督黎元洪的外国记者。丁格尔不仅用相机拍摄下了当时的革命场景，还写了《辛亥革命目击记》一书，留给后人许多珍贵史料。这本书1912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在上海、伦敦、纽约同时发行。

丁格尔与黎元洪私下关系不错，在《辛亥革命目击记》一书中，他对黎元洪做了如下描述：

中国的革命是世界历史上最令人激动的事件之一。如果没有黎元洪，中国可能不会有这场革命，他的名声现在已传遍了文明世界的每个角落。历史即将证明，黎元洪是中国贡献于世界的最伟大的改革家。他杰出的领导才能以及他领导



1912年1月的黎元洪，此时他刚刚当选中华民国副总统兼鄂军都督。



1912年4月9日，应鄂军都督黎元洪邀请，孙中山率子女孙科、孙
艇、孙婉及随员访问湖北。图为孙中山在湖北都督府与欢迎人员合
影。前排左二起：孙科、汪精卫、黎元洪、孙中山、胡汉民、李晓
生；二排左五起：孙婉、宋霭龄、孙艇；三排右四为廖仲恺。

人民取得迅速改变的例证，使新中华在东西方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在国家生活中默默无闻之辈变成政治知名度最高的人。很少有人被赋予改变一个民族与整个社会生活发展趋势的重任，在历史上尚无人像黎元洪领导中国革命时做的那样，被赋予重新规划全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社会和政治前途的使命。以世界眼光看，他是一个超凡脱俗的人，是他这一代最有成效的改革家。

黎元洪是一个英俊的中国男人。身高约有5.3或5.4英尺，剪掉了大辫子，一头浓密粗硬的黑头发；眼睛微微眯起，不时闪着异常热烈的光芒，他的下巴给人以无比坚毅的感觉，如果不了解他的军队背景，他容易被当作一个富有的中国商人。



1912年孙中山在武昌与黎元洪合影。

到了1912年，黎元洪又更进一步，成为中华民国副总统，兼领鄂督。1912年4月1日，刚刚当选临时大总统没多久的孙中山没有食言，将大总统之位让与逼迫清帝退位的袁世凯。黎元洪此时邀请孙中山访鄂，一来是表示对孙的尊重，二来更是借机扩大一下自己的影响力。

有人说，1893年孙中山在广州行医时，黎元洪正在“广甲”舰当管轮。舰上有士兵病了，黎元洪就请孙中山上舰看病，两人的第一面就是这样见的，不过当时他们并没有深入接触。等到了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当了大总统，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一个在南京，一个在武汉，两人仍旧未见面。直到这次，黎元洪邀请孙中山来武汉访问，并热情接待了他，两人言谈甚欢，才算是正式相见。孙中山、胡汉民都非常肯定黎元洪的功劳，甚至称赞他为“民国第一伟人”。而1912年10月辛亥首义周年庆典之时，成立于1861年的武昌显真楼照相馆还曾专门摄制过一批孙中山和黎元洪的照片并大量出售，深受市民的欢迎。

不管是不是床下都督，黎元洪的“十月革命”都足以让人铭记。

黎元洪与袁世凯



黎袁二人的关系绝非一般，他们既是儿女亲家，也是互相敬重的老朋友；既是政治上的伙伴，更是一对不折不扣的敌人。

袁世凯“请君入瓮”

时常有人问，黎元洪对袁世凯到底是什么态度？这个问题，还真不是一句两句能说得清的。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两位重量级的人物，黎袁二人之间的关系绝非一般。他们既是儿女亲家，也是互相敬重的老朋友；他们看起来像是政治上的伙伴，但其实更是一对不折不扣的敌人。

黎元洪有一个绰号叫“黎菩萨”。“菩萨”之名，谓其面善，脾气好，气度雍容，像一尊菩萨。历史中的黎元洪，有时候的确有些“菩萨心”。

英国摄影师埃德温·丁格尔在其1912年出版的《辛亥革命目击记》一书中，对黎元洪1911年底时的心态做了翔实的记录：